

# 在新的歷史視野中走近 張春橋

## ——評鄭重《張春橋：1949 及其後》

● 宋永毅



鄭重：《張春橋：1949 及其後》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雖然人們常說歷史是由戰勝者來寫的，但是戰敗者的歷史卻絕不容忽視。且不說這種逆向思維的敘事常常可以提供鮮為人知的史實，成為對勝利者歷史的一種難得的補

充；更為重要的是，它常常在不經意的細節中剝去勝利者歷史中人為的油彩，提供對完整的歷史場景進行觀照和審視的多維視野。

近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鄭重的《張春橋：1949 及其後》(以下簡稱《張春橋》，引用只註頁碼)就是一本專為「失敗者」立傳之作。作者是一位學者型的資深記者，自196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後，在《文匯報》工作了四十餘年。除了數以千百計的工作上的採訪報導外，他還著有《毛澤東與〈文匯報〉》等學術著作和《謝稚柳傳》、《張珩》等多部書畫大家和收藏大家的傳記<sup>①</sup>。談及撰寫人物傳記的主旨時，鄭重曾自喻「不歡喜趕熱鬧，歡喜寫一些被忽略的或者受冷遇的人」<sup>②</sup>。按作者的說法，這本耗時十餘年寫成的傳記並非是「為張春橋開脫翻案」，而是為了「尋找張春橋，特別是尋找真實的張春橋。……在尋找張春橋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我不是審判者，張春橋也不是受審判

《張春橋：1949 及其後》是一本專為「失敗者」立傳之作。鄭重這本耗時十餘年寫成的傳記並非是「為張春橋開脫翻案」，而是為了「尋找真實的張春橋」。

在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公眾視野裏，張春橋是一個被臉譜化的人物，帶着眾多的政治標籤。《張春橋》不從政治是非上來給人物定位，而採取了一種較為中性的概括定義：「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

的人。他是這本傳記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礎上，我和他進行平等的對話。我是以誠實的態度對待歷史素材，更是以誠實的態度對待張春橋（〈自序〉，頁 viii）。平心而論，讀者是不難在掩卷之際體味到作者竭力追求治學的公正與赤忱的。

《張春橋》縱篇近七十萬字，共二十二章，按張春橋政治生涯的軌迹記述了他 1949 年 5 月從華北解放區重返上海，擔任上海軍管會新聞出版處的軍代表，直到他在 1976 年毛澤東死後的政變中被捕，2008 年死於保外就醫期間的全過程。值得一提的：其中描述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活動有十八章，佔了八成的篇幅。作者並不是一個能接觸文革機密檔案的人，除了公開出版的資料，書中的史實大多來自他作為一個專業記者在巨量的訪談中的仔細挖掘。因為官方的嚴密限制，作者無法採訪獄中和保外就醫（換一種監禁方法而已）後的張春橋本人，但所有能夠找到的張春橋在文革前的同事、上下級，以及文革中的秘書、「同黨」、家人和親屬，他都採訪到了。以這些口述史料為基礎，並和現有的所有相關出版物一起映襯勘比，構成了本書鮮明的記者型的特色：一種在不懈的採訪挖掘中把被遺棄的歷史碎片還原成完整真相的不凡功力。

## 一 歷史定位：毛澤東、張春橋的互動和互需

毋庸諱言，在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公眾視野裏，張春橋是一個被臉

譜化的人物，帶着眾多的政治標籤，諸如「叛徒」、「篡黨奪權的陰謀家」、「野心家」等等。《張春橋》不從政治是非上來給人物定位，而採取了一種較為中性的概括定義：「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作者認為，跟隨和理解毛澤東的步伐和思想，是相當一部分從延安走出來的革命知識份子的普遍心願，但不幸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毛澤東身邊的筆杆子都一一被淘汰出局，而張春橋卻和毛澤東相知始終，並被毛澤東視為知音。之所以如此，「靠的並不是對毛澤東的高調歌頌」，而是因為「他把自己定位為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想在理論上制勝，或許認為理論比權力的壽命更長」。總之，「他只不過是毛澤東棋盤上的一顆棋子，沒有這顆棋子，毛澤東晚年的棋就可能是另一種下法」（〈自序〉，頁 viii、ix）。

「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這一歷史定位，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以為還可以進一步發掘毛澤東和張春橋之間的互動，即毛澤東身邊的筆杆子集團——極左派的理論精英對毛澤東晚年思想形成的主動貢獻和反饋影響。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對於毛澤東的馬列理論素養都有過高估計的傾向。事實上，毛澤東從沒有過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有的只是一些反官僚主義的零碎的、不成系統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片言隻語。但是，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欲望和陰謀，比他在理論上的創造都要強烈千百倍。毛澤東又是一個自負甚高的「革命導

師」，不希望自己對劉少奇的鬥爭被認為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從而失去道德制高點，所以需要製造出一套玄妙的革命理想和理論來美化他發動的政治運動。事實上，這些理想和理論是毛澤東和他的筆杆子集團一起創造的。比如，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直到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才由王力和陳伯達在馬列著作裏為他總結出來；當時總結得匆匆忙忙，是因為2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卡博(Hysni Kapo)和巴盧庫(Beqir Balluku)來訪，必須要給他們提供一些文革的馬列理論根據<sup>③</sup>。這一過程用現代漢語的大白話來說其實是「共謀」，而用中共官方的漂亮套話來說，便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了<sup>④</sup>。

其實，作者在書中也已經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張春橋和毛澤東之間的這種互動。其一，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論性文件，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外，主要還有由張春橋起草和修改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此中，張春橋發明了一個「黑線專政論」，即「文化戰線上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毛澤東看後大加讚賞，在進一步的修改中加上了一段專文字：「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

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如果說張春橋的「黑線」大約還只是指當時的文藝界領導周揚等人，毛澤東則受張春橋的啟發，把它發展成「全盤的系統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問題(頁176-77)。文革發動時的另外幾個綱領性文件中，張春橋還起草過提出「巴黎公社原則」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正式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1966年林彪的國慶講話等。前者張春橋是被毛澤東譽為「出力最多」的兩個起草人之一(另一個是王力)，後者張春橋則是唯一的執筆人。此外，張春橋還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人。

其二，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因接班人問題的失誤而長期處於一種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處境裏，最後又想到了創造玄妙的理論來轉移視線和掩蓋自己錯誤的舊招數。1975年，姚文元和張春橋受毛澤東委託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兩篇重頭文章，不僅把林彪集團和地主資產階級掛鉤，還把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怪罪到人類社會在一定的文明階段裏的必然產物頭上，諸如商品制度、貨幣交換、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等<sup>⑤</sup>。其實馬克思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雖然偏頗，但還是遠沒有荒謬和偏激到要對商品和貨幣等實行「全面專政」的地步。張春橋等極左派理論

作者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張春橋和毛澤東之間的互動。如果說張春橋的「黑線」大約還只是指當時的文藝界領導周揚等人，毛澤東則受張春橋的啟發，把它發展成「全盤的系統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問題。

張春橋臨死都不肯放棄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因為他本人也是這一思想體系的構築者之一。然而，就此得出張春橋是一個純粹的革命理想主義者的結論，那就太單純幼稚了。作者客觀地描述了一些歷史事實，揭示了理想主義者背後的功利背景。

家聲稱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然而他們所闡釋的毛澤東的最新思想才是真正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倒退性的修正。張春橋不僅有其言，還有其行。1975年，他就想在上海幹部中重新實施供給制，只是因為上海市委主管經濟的書記馬天水測算後告訴他，其花費會數倍於現行的工資制，市裏的預算根本無法承擔，他才悻悻作罷（頁630）。這種革命理想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和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倒行逆施顯而易見。從毛澤東〈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到張春橋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理論的要害，就在於用歷史和社會形態的倒退來避免人類在高級文明發展階段中難免出現的弊端。不僅如此，他們還要用手裏的獨裁權力來「全面專政」、強行實踐他們的烏托邦幻想，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

張春橋在中國大陸沒有取得成功的「全面專政」的實驗，後來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毛澤東的直接支持下得以實現。張春橋在1975年12月曾秘密訪問柬埔寨，高度讚揚紅色高棉廢除貨幣，做了「中國沒有做到的事」，把柬埔寨變成一個「了不起的意識形態的試驗場」<sup>⑥</sup>。張春橋當然沒有提到這一試驗慘絕人寰的後果：柬埔寨在數年內變成一座大兵營和大監獄，監禁、酷刑、處決和飢餓造成了近兩百萬柬埔寨人的死亡，佔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強<sup>⑦</sup>！

寫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解釋為甚麼張春橋臨死都不肯放棄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因為他本人也是這一思想體系的構築者之一，而

政治人物最難做到的正是否定自己。張春橋即便在1998年保釋出獄以後，還是毛澤東文革理論文庫中的一塊「活化石」。然而，如果我們就此得出張春橋是一個純粹的革命理想主義者的結論，那就太單純幼稚了。作者客觀地描述了一些歷史事實，揭示了理想主義者背後的功利背景。上海市委的原第一書記陳丕顯，是「紅小鬼」（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童兵）出身的長征幹部，在文革發動期間對江青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作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活動，曾表示大力支持。為此，毛澤東對他也曾寄予厚望，希望不要把他「燒焦了」，多次暗示他「出來工作」（頁322）。

其實，陳丕顯已經在竭力「出來工作」，作為上海「一月奪權」的兩個基石性文件〈緊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就是陳丕顯和造反派一起擬定，並由他直接簽署的。由於這兩個文件得到了毛澤東的極力讚賞，對張春橋的上海第一把手地位造成了威脅，於是張春橋長期對毛澤東隱瞞真相，並不光彩地和深知內情的上海市委寫作組組長朱永嘉等人統一口徑，貪天功為己有（頁326-27）。以後，張春橋又一直藉口群眾的反應阻礙陳丕顯的解放——既不把他結合進市革會的領導班子，也不放他離開上海，讓他脫離社會和群眾，直到1974年毛澤東直接批示，才為陳丕顯安排了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虛職，並迫使他向中央要求調出上海（頁392-95）。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來探討一下為甚麼中央文革小組其他的筆杆子



(如早期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後期的陳伯達)被毛澤東逐步拋棄，而張春橋始終不倒的問題。除了張春橋和毛澤東在文革理論上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外，《張春橋》還列舉了多種個人性格和政治經驗等原因。比如，張春橋在重大的理論問題上從不別出心裁地開風氣之先。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批評過戚本禹關於軍隊可能發動「熱月政變」的講話，指出：「軍隊的事你們不要亂說……你看張春橋，從來就不亂說話。」(頁195)又如，有時毛澤東講錯了，張春橋即便原來只是負責跟進，也願意出來為毛澤東承擔責任。「一月奪權」後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毛澤東的原意，但毛澤東改變主意後，張春橋主動檢討認錯，為毛澤東承擔責任，自然「深得帝心」(頁376)。再如，張春橋進京後從來不和其他中央領導有工作以外的關係，時刻表明自己是一個目不旁顧的只忠於毛澤東的人，可謂用心良苦(頁195)。

然而，上述這些都還不是最為關鍵的。作者在講到張春橋的自我定位時還寫到：「他首先是一個地方官，其次才是京官，或者說是一位外放的京官。如此則進有據，退有援，可以從容應對越來越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頁389)換句話說，張春橋把他擔任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上海，當作了他實踐毛澤東文革理論的試驗田和根據地——這才是毛澤東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筆杆子卻都沒有這樣的條件和實踐。如果說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在沒有毛

澤東耳提面命的情況下簽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要求是冒險「揣摩聖意」<sup>⑧</sup>，那麼在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張春橋主政的上海在全國烽火連天的情形下，主動為毛澤東提供了他的文革理論完全可以取得成功的樣板。文革中流行的口號「全國看上海」，並不是一句虛言。論大聯合，張春橋在上海基本上未經大規模的血雨腥風就能自成一派，即便是在1967年8月全市鎮壓反對派「支聯站」和「聯司」的行動中也沒有動用槍炮，因此得到毛澤東的稱讚<sup>⑨</sup>。論大批判，張春橋控制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一直有全國影響，他手頭還有「羅思鼎」、「丁學雷」等一流的極左派寫作組。1968年，其他省市還在忙着成立革命委員會之際，上海已經展示了第一批文革鬥批改的成果。無論是「赤腳醫生」、「七二一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教育革命」的調查報告，都被毛澤東直接批示，作為重要成果指導全國<sup>⑩</sup>。

更為重要的是，上海一直是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典範。即便在文革中，上海的工農業總產值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1966-1970)，上海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增長達10%；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1971-1975)，年增長也有7.38%，共增長41.9%<sup>⑪</sup>。尤其是上海工業生產總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文革中也達到了平均每年16.91%的水平，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中是首屈一指的<sup>⑫</sup>。

儘管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搞亂了全國，但是他決不會認為是自己的理論和決策錯誤，反而一貫把責任

張春橋把他擔任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上海，當作了他實踐毛澤東文革理論的試驗田和根據地——這才是毛澤東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筆杆子卻都沒有這樣的條件和實踐。

推到劉少奇、林彪等政治對手和一切「階級敵人」的身上。同時，無論是自我安慰還是堵人口實，毛澤東都急需一個穩定的省市作為其理論的成功佐證，而張春橋主政的上海正不斷提供這種樣板。這樣，毛澤東和張春橋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作者所言的毛澤東多次「救了張春橋」（頁776），還應當是毛澤東通過「救了張春橋」來拯救自己的文革部署和實踐。總之，兩人之間除了理論上的互動，還有實踐上的互需。

毛澤東和張春橋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作者所言的毛澤東多次「救了張春橋」，還應當是毛澤東通過「救了張春橋」來拯救自己的文革部署和實踐。總之，兩人之間除了理論上的互動，還有實踐上的互需。

## 二 「另類」史實：「宮廷政治」中的明爭暗鬥

《張春橋》另一個值得稱道之處，是作者打開了「失敗者」看歷史的逆向視域，提供了不少對官方的中心敘事具有顛覆性的「另類」史實，從而展示了一種新的觀照文革中中共高層鬥爭的史觀。對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書、張春橋的知音蕭木之口說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們〔張春橋、周恩來、華國鋒等人〕的距離比較近，在我眼中沒有壞人，但他們都是悲劇人物。」（頁713）中共高層「宮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興衰而無正邪、有成敗而無是非，無論哪一方都不乾淨。而文革後一直佔據「好人」的歷史大義的「四人幫」反對派，在權力鬥爭的手段技倆上有時遠比他們要反對的一方更陰險狡詐一些。

林彪事件以後，張春橋、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來、葉劍英等

「元老派」處於對壘狀態。毛澤東出於制衡權力體系的需要，對兩個宗派都是有所批評的。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外，1975年1月，毛澤東提議張春橋當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遭到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的聯合反對，毛澤東就批評他們說：「你們三個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幫』。」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還批評葉劍英不要搞「廣東幫」（頁679-80）。由此可見，「幫」字在毛澤東口裏不過是對黨內派系活動一種揶揄式的評語而已，把毛澤東對張春橋等人「同志式」的批評上升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使人比較震驚的，還有本書所揭露的周恩來為打倒政治對手所進行的工於心計的活動（頁670-71、850-53）。因為毛澤東對張春橋格外器重，使張春橋有可能在周恩來死後接任總理，周恩來便開始對他進行種種打擊，主要是在「歷史問題」上把他說成是「叛徒」，而說張春橋是「叛徒」的所謂「黑材料」，來自林彪軍人集團成員邱會作所支持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旗」。邱會作和張春橋之間有很深的個人恩怨，張春橋在文革初期支持「紅旗」的對立派「紅縱」，造了邱會作的反，邱會作為了報復便支持（或指使）「紅旗」炮打張春橋和收集他的「黑材料」。周恩來聽說了此事，便暗示邱會作讓「紅旗」以「群眾來信」的名義把這些材料寄給自己，再轉給毛澤東<sup>⑬</sup>。周恩來這麼做，一來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團一起收集張春橋「黑材料」的



1972年2月，周恩來在上海設宴招待訪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張春橋一起作伴。(資料圖片)

嫌疑，二來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眾揭發」包裝了自己打擊政治對手的真實用心。

其實，張春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捕過，「叛徒」一說實為子虛烏有。筆者在上海文革中親身參加了炮打張春橋的活動，也見聞過「紅旗」等組織收集的張春橋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論，實在都是一些捕風捉影和道聽途說的東西。比如，其中有一傳言談到1940年間張春橋在國民黨設於南京的江蘇反省院寫過「自首書」和「反共啟事」，但那時張春橋已經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寫「自首書」呢？以周恩來幾十年的地下工作經驗和一貫為人稱道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應當不難一眼看透那些明顯的破綻。何況他本人就有過這種遭人誣陷的「歷史問題」。1967年5月，南開大學紅衛兵在舊報紙中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而「伍豪」是周恩來在黨內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誣陷，鬧到江青和毛澤東那裏以後，周恩

來立刻做了多次反駁，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這一啟事在1932年2月於上海各大報章刊登時，他已經身在江西中央蘇區了<sup>⑭</sup>。

比較周恩來、張春橋這兩宗為人誣陷的案件，應當說張春橋案更容易讓人一眼穿透，因為連一份類似的書面啟事都不存在。但奇怪的是，周恩來竟死死抓住張春橋所謂的「叛徒」問題不放，明裏暗裏打擊張春橋。1973年，周恩來和鄧穎超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到上海，鄧穎超特地拜訪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幾乎所有的新老幹部的家，卻有意不去張春橋家，還公開地揚言：「只有一家沒有去。不去的原因，你們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頁861)這顯然是暗示張春橋太太文靜曾經變節的「歷史問題」和張春橋的「叛徒」問題<sup>⑮</sup>。1974年12月，周恩來還在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時，當面提出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以阻止張春橋當總理<sup>⑯</sup>。除此以外，周恩來還把這些從來未經

作者打開了「失敗者」看歷史的逆向視域，提供了不少對官方的中心敘事具有顛覆性的「另類」史實，展示了一種新的觀照文革中中共高層鬥爭的史觀。例如周恩來為打倒政治對手所進行的工於心計的活動，以及葉劍英對王洪文的暗算。

證實的問題擴散開去。1973年4月9日，周恩來非常肯定地對來看望他的鄧小平夫婦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sup>⑩</sup>而當時的鄧小平還在被審查。周恩來作為一個因所謂的「歷史問題」在文革中受誣陷的受害者，卻不斷地用別人迫害他的方法對待張春橋，這實在很能說明中共的「宮廷政治」的特質：無原則的暗算、陰謀、攻訐。

或許，本書所披露的葉劍英對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發經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中共十大上，毛澤東決定培養王洪文作為接班人。在當時的政治局裏，元老派挺王洪文最力的是周恩來和葉劍英。王洪文當時被毛澤東調到中央學習各方面的理論、方法和經驗，但葉劍英卻總是邀請王洪文到中南海釣魚、去郊外打獵，還將軍委所在地一套高規格的樓房撥給他。平時葉劍英常邀請王洪文赴宴，王洪文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無法推辭，葉劍英卻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他灌醉（頁719）。張春橋雖然設法勸阻王洪文不要「上這些人的當」，但王洪文並不聽勸。令王洪文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葉劍英在背後又把他林林總總的表現都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形塑王洪文不堪培養的紈袴形象，以致毛澤東失望地感歎說：「釣魚台無魚可釣。」（頁792）更具諷刺意義的是：這些事迹後來又都出現在華國鋒、葉劍英等中央高層列舉「四人幫」罪證的文件裏，作為「新生資產階級份子王洪文的罪證」，證明他「大量貪污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資財」<sup>⑪</sup>。葉劍英這麼做可謂一箭三雕：其一，使王洪文對

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從龍之功；其二，拉攏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張春橋、江青的關係；其三，在毛澤東那裏破壞王洪文的名譽，使毛澤東對他選的接班人失望。對於曾被葉劍英玩弄於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捕以後有過錐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監獄裏對着張春橋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錯了！」（頁798）

作者還揭示了中共「宮廷政治」的另一個特質：持續不斷的內鬥。周恩來逝世以後，華國鋒被毛澤東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務實派」和以張春橋為代表的「務虛派」又發生矛盾，結果竟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發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宮廷政變」。華國鋒聯合葉劍英等元老派，動用軍隊一舉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按官方長期以來的說法，這是因為張春橋等人施行陰謀詭計，要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對此，作者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首先，根據作者對大量史料的調查梳理，張春橋和王洪文對於毛澤東最後選擇華國鋒作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擁護，保證支持」的（頁716）。尤其是張春橋，如果要他在華國鋒和王洪文之間做一個選擇，甚至可能還是會選華國鋒<sup>⑫</sup>。本來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三駕馬車的形勢還是可以穩定地運行幾年的，只是「華國鋒太急於想『獨掌乾坤』了，結果後來自己也沒有好下場」（頁767）。

其次，無論是華國鋒、葉劍英抑或汪東興，在發動10月6日的「宮廷政變」時都說過「四人幫」已

關於1976年的「宮廷政變」，按官方長期以來的說法，這是張春橋等人要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根據作者對大量史料的調查梳理，張春橋和王洪文對於毛澤東最後選擇華國鋒作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擁護，保證支持」的。



經在布置發動「武裝政變」了，他們必須「先下手為強」。作者在經過詳細的考證後，認為這說法沒有任何事實依據，不過是一種為打倒政敵製造的倒打一耙的藉口；對此，現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漸有了一定的共識<sup>②</sup>。

最後，出現在〈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張春橋親信徐景賢有關張春橋下令武裝政變的證詞，其實是一種「偽證」<sup>③</sup>，原因是在徐景賢被監禁期間，華國鋒通過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趙蒼壁派人告訴他：只要承認張春橋給上海下過武裝叛亂的指令，就可以免於起訴和處分。為此，徐景賢做了假證（頁790）。

有關華國鋒發動政變的必然性，本書借蕭木之口有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質是皇權由一人獨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許有不同政見，更不能容忍出現派別。歷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廢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繼位，他們的命運幾乎全都是一個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時間略有先後。此類實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過華國鋒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繼位，便可無師自通。道理很簡單：左邊一個是曾經有可能入選的接班人張春橋，右邊一個是已經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華國鋒坐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心裏能踏實嗎？於是這位原來曾經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麼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澤東一去世，便與

功臣派聯起手來，發動了一場稱之為「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十·六政變」。（〈代跋〉，頁880）

這一體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尋味的，它至少證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從沒有跳出過封建王朝黑暗的「宮廷政治」的怪圈。

### 三 接受理論：誤讀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

在談到1974至1976年間的政事件時，《張春橋》對它們作出了實事求是但又引人深思的解讀。當時，群眾對張春橋、姚文元掌握的宣傳部門非常不滿，認定他們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利用「梁效」、「羅思鼎」等寫作組寫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的文章（頁586-88）。此外，憤怒的讀者還認為在1976年周恩來逝世後，張春橋繼續指令《文匯報》發表暗批周恩來的文章，結果引發全國性的群眾抗議，成為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頁725-28）。

確實，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直接領導的「梁效」寫作組寫了〈孔丘其人〉等文章，上海市委寫作組也不甘落後，先後發表的文章有署名「康立」的〈漢代一場儒法大辯論——讀鹽鐵論札記〉和署名「羅思鼎」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鬥爭——兼論儒法鬥爭的社會基礎〉等等。〈孔丘其人〉中有這樣描寫孔子的句子：「71歲重病在牀的時候」，「還掙扎着爬起

群眾對張春橋、姚文元掌握的宣傳部門非常不滿，認定他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利用「梁效」、「羅思鼎」等寫作組寫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的文章。憤怒的讀者還認為周恩來逝世後，張春橋繼續指令《文匯報》發表暗批周恩來的文章，結果引發全國性的群眾抗議。

讀者對張春橋等人控制的《文匯報》產生「陰謀批周」的誤讀，是因為他們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中積累的「審美經驗」，便是任何談歷史的文本中都有影射當代政治的可能性——這就是他們的「期待水準」。

來，端着一隻胳膊，搖搖晃晃地走去見魯君」（頁585-86），這在當時被不少細心的讀者認定是影射周恩來。但後來據該文作者范達人說明：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此文是江青經毛澤東同意，還經周恩來看過才發表的<sup>②</sup>。至於上海市委寫作組那幾篇文章，據作者的調查，文章的組織者朱永嘉堅決否認和張春橋有任何關係。這些文章也曾被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央專案組立案審查，但最後它都否定了朱永嘉利用批林批孔或批鄧來「批判周恩來」的罪名。

周恩來逝世後，上海《文匯報》還有過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的兩篇報導：1976年3月5日，《文匯報》夜班編輯在編排新華社一篇關於部隊學雷鋒的電訊稿時，因為版面篇幅的關係，刪去了包含周恩來題詞內容（並非題詞本身）的段落。時值周恩來病逝不久，這一正常的編輯工作便被細心的讀者憤怒地指責為「反對周恩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匯報》刊登了上海儀表局基層通訊員在該局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篇報導，文中有一句「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按該基層通訊員的解釋，前者是指當時備受批判的鄧小平，後者是指周榮鑫和胡耀邦等人。但讀者並不這麼理解，他們認為前者是影射周恩來，後者才是指鄧小平，於是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南京的群眾還在上海和北方之間的來往列車上，刷上「《文匯報》的文章是反黨奪權的信號，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把赫魯曉夫式

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的張春橋揪出來示眾！」等口號（頁726-27）。當時中共為平息這一全國性的風潮，經毛澤東圈閱批准，於4月1日發出〈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指出：「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sup>③</sup>本書也指出，儘管這兩個事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都是中央專案組的清查重點，但最後也只能得出其中實際上不存在反周陰謀，只是讀者的誤讀誤解的結論。

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讀者的誤讀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作者認為：這些事件「雖然使群眾產生了誤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歷史上一些因偶發事情而引發出重大的歷史事件那樣，它們激化了群眾憤怒的情緒」（頁728）。作者能夠看到歷史發展中偶然性的作用，這是很有見地的，但還是沒有更深一層透析為甚麼群眾會產生這種定向的誤讀誤解。如果我們借用西方文學和歷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論來作一觀照，或許會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論或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文學史教授堯斯（Hans R. Jauss）在二十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sup>④</sup>。他認為，作品的美學實踐應包括文本的生產、流通和接受三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讀者通過自身的審美經驗「再創造」作品的過程，讀者在作品中發掘出並認定的種種，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蘊；當然，它受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

治歷史條件的限制，從而產生一種對某種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準」。如果我們把「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理解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傳部門對讀者長期的「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捕風捉影的教育，以及發表在各種報刊的牽強附會的影射史學的文本，便不難理解為甚麼讀者會對張春橋等人控制的《文匯報》產生「陰謀批周」的誤讀。因為他們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中積累的「審美經驗」，便是任何談歷史的文本中都有影射當代政治的可能性——這就是他們的「期待水準」。

細究起來，張春橋還是導致文革中「期待水準」的創始鼻祖之一。他參與寫作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sup>29</sup>，就誤讀了吳晗的作品，把寫於1960年的這一部歷史劇和1961年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當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誤讀」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眾對《文匯報》有關文章的誤讀則出於無意的憤懣，其接受方式不過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罷了。然而，誤讀畢竟是誤讀，不是事實真相。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積澱，我們沒有任何必要再讓歷史保持沉默。

#### 四 餘論

總而言之，《張春橋》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失敗者」傳記。它開拓了觀照歷史的新視野，又在探索中走近了真實的歷史人物張春橋，從而也在走近文革真相的路上邁出

了堅實可貴的一步。然而，本書還有一些較為明顯的缺點和可以商榷之處。

首先，全書的篇幅達七十萬字左右，顯得過於冗長，不夠精煉。在一切都趨於快速和電子化的今天，如此的鴻篇巨製會使一般讀者、尤其是年輕人望而生畏。在筆者看來，這一缺點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傳」和「史」，即張春橋的個人傳記和整個上海文革史的寫作有關。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但並不等於說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無鉅細地描述和討論。比如，本書第八章「市委心臟爆炸：寫作班造反」用了整整一節，以七八千字來理論性地討論「奉旨造反」，便有稍稍離題之嫌。

其次，作者的一些立論是可以商榷的。比如，第十五章「難識廬山真面目」中貫穿對毛澤東、林彪衝突的一種看法，即「林彪以《第一號通令》向毛澤東挑戰，毛澤東以更換接班人來向林彪應戰」（頁534），但這一說法及引用的史料都需要再審視之處。第一，1969年10月18日由林彪簽署的關於備戰的緊急指示並沒有挑戰毛澤東權威的主觀意圖，不過是履行他作為國防部部長的職責罷了。第二，毛澤東在1970年4月25日和林彪談及林彪的接班人選時並沒有讓張春橋「更換」林彪的意思，而是討論「接班人的接班人」問題。據文獻記載，這也不是毛澤東第一次和林彪談及以張春橋作為林彪的接班人，中共九大期間毛澤東提名張春橋當

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傳」和「史」——張春橋的個人傳記和整個上海文革史的寫作。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但並不等於說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無鉅細地描述和討論。

作者多次引用張春橋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我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寫一部《毛澤東傳》。」在中共政壇上風風火火幾十年的張春橋，怎麼可能還是一個只想寫一部傳記的文人呢？

大會秘書長，還就第三代接班人問題和林彪談過話，在談到「你年紀大了以後誰來接班」時，毛澤東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sup>⑥</sup>。可見毛澤東並沒有利用張春橋來向林彪「應戰」的意思，只是表露了在未來的國家體制上想逐步回歸「文官政治」的想法，他和林彪的談話也尚在討論的層次。第三，據葉群在2015年透露的毛澤東、林彪談話記錄，張春橋並不像本書描述的那樣在談話現場<sup>⑦</sup>。作者所引述的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其實也沒有說張春橋在兩人討論以他作為「接班人的接班人」的現場<sup>⑧</sup>。不過，毛澤東這一有關隔代接班人的想法引起了林彪及軍人集團過度激烈的反應，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策劃了向張春橋主動進攻，最終導致毛澤東、林彪的分道揚鑣，這大概又是兩人最初都不曾想到的。

最後，作者在談到張春橋的「野心」時，多次引用了張春橋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我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寫一部《毛澤東傳》。」（頁654）其實，我們大可不必把它當真，此說不過是政治人物掩飾自己胸中抱負的戲言罷了。「野心」（ambition），無論在英語還是西方政治中都不是一個貶義詞。不同於中共虛偽的政治道德，從現代政治學的觀點來看：一個政治人物有他的理想抱負，絕非是一種要譴責的事，關鍵還是在於他的主張正確與否。此外，張春橋在文革前就在中共官場上高踞要位，文革中更成為政治局常委級的共產黨政客，在中共政壇上風風火火幾十年的張春橋，怎麼可能還是一個只想寫一部傳記的文人呢？

## 註釋

① 參見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謝稚柳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張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② 宋炯明：〈畢竟文匯人——高級記者鄭重素描〉，《新聞記者》，2008年6月號，頁75。

③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86-87。

④ 這一提法第一次出現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通過），《人民日報》，1981年7月1日。

⑤ 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紅旗》，1975年第3期，頁20-29；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紅旗》，1975年第4期，頁3-12。

⑥ 王友琴：〈張春橋幽靈在飄盪〉（2017年1月28日），開放網，[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115#.W7XBfnszaUk](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115#.W7XBfnszaUk)。

⑦ 宋征：《毛澤東主義的興亡：中國「革命」與紅高棉「革命」的歷史》（華盛頓：美國陽光出版社，2013），頁838。

⑧ 張春橋親信徐景賢在論及此事時說：「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做出了毛澤東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範圍內把群眾發動起來，更廣泛地動員群眾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證這場運動的勝利。」參見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頁65。

⑨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第二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901-908。

⑩ 這三個報告分別是：〈從上海機牀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人民日報》，1968年7月22日；〈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人民日報》，1968年9月14日；〈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



學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人民日報》，1968年9月5日。

⑪ 孫懷仁主編：《上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簡史（1949-1985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475、487。

⑫ 朱婷：〈20世紀50-70年代上海「老工業基地」戰略定位的回顧與思考〉，《上海經濟研究》，2011年7月號，頁116。

⑬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冊（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頁635。

⑭⑯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220-24；540-41。

⑰ 文靜在1943年被日本軍隊俘虜後有過變節行為，但沒有出賣組織。為此，中共在1949年已經批准她重新入黨，這一「歷史問題」應當已經解決。此處的「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恐怕更可能是指張春橋的所謂「叛徒」問題。

⑱ 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251。

⑲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年3月6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第三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3）。

⑳ 王洪文原是張春橋一手扶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頭頭，對張春橋言聽計從。1973年，他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進京後，和張春橋發生了一些矛盾。一是上文提到的葉劍英對王洪文的拉攏，損害了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派的關係；二是當時上海發生了《朝霞》事件，即王洪文和他的工人造反派兄弟對張春橋下屬市委寫作組編的《朝霞》發動圍攻，責令停刊檢查。這使張春橋和王洪文的關係產生了很深的隙罅。詳情參見本書頁610-15。

㉑ 參見劉健：〈回顧「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陰謀篡黨奪權而不是四人幫〉，《當代中國研究》，2016年第2期，頁95-118；韓剛：

〈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頁48-55。

㉒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6年12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㉓ 范達人：〈梁效幾篇重點文章的寫作經過〉，《炎黃春秋》，2014年第3期，頁17-19。

㉔ 〈中共中央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1976年4月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㉕ 參見Hans R.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㉖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

㉗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88；史雲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2012），頁372-73。

㉘ 于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昨天》，第56期（2015年8月30日），[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Yesterday\\_56-.pdf](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Yesterday_56-.pdf)，頁5。

㉙ 本書提到：「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樣？有張春橋在場，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頁533）這裏恐有史實錯誤。毛澤東、林彪都是政治老手，一般有關張春橋當第三代接班人的談話，不會讓他在場。本書所引高文謙一書，也沒有如此記載。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76。

宋永毅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圖書館員。